

关于1922年香港海員罢工的几个問題

金 应 熙

1922年1月12日至3月8日的香港海員罢工，已經过去四十年了。这次罢工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对英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开端，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这次罢工，过去已有人作过不少研究^①。但是，有几个問題还待进一步解决：罢工期間斗争形势的发展問題；海員工人斗争策略的特点問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如何帮助并指导这次罢工問題；广州国民党政权对海員罢工的态度問題等。本文拟根据目前找到的一部分原始資料就上列問題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罢工斗争的三个阶段

香港海員罢工刚开始，香港英国当局就立即支持輪船資本家，对海員施行高压，从而使罢工自始就带有直接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性质。罢工坚持了五十六天，规模不断扩大。罢工开始一星期后，罢工海員人数是六千五百人。一月底发生香港运输工人同情罢工，使罢工人数增至三万人以上。到3月1日，又发生了全港工人的同情总罢工，使罢工人数激增到十万人以上。罢工的两次扩大，使斗争形势发生較大的变化，将罢工斗争分成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1月12日至一月底）中，海員工人克服了少数领导人在英国当局高压下的动摇，按照罢工前原定计划紛紛回到广州，組織了糾察队，分头到广东各个港口去，禁止把粮食运往香港，对香港实行封鎖。同时，又积极进行組織香港运输工人的同情罢工，以加强对香港英国当局和輪船資本家的压力，迫使他們迅速接受海員所提的条件。

① 邓中夏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簡史》第四章专章論述了这次罢工。此外如宜彬的《香港海員大罢工》、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史室的《广东海員斗争簡史》等，都是有关这次罢工的专著（《簡史》未刊印），作者在研究中得到这些书的不少启发。下文叙述中，資料出自邓书的，不再一一注明。

这一阶段中，英国当局对付罢工的手段主要是高压。早在罢工开始后几小时，香港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就赶到工会对海员们施加压力，企图诱骗工人先行复工，被海员积极分子苏兆征痛加驳斥，夏理德计不得逞。次日（1月13日），海员工会少数领导人翟汉奇等在英当局压力下动摇，擅自散发传单，伪称增加工资已得解决，通知工人于1月16日一律复工。苏兆征等随即对翟汉奇等人的动摇妥协展开斗争。在罢工海员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非由轮船资本家签字接受海员条件，决不复工。于是，英当局破坏罢工的第一次阴谋，才归失败^②。

英国当局和轮船资本家的态度，此时十分蛮横。由于翟汉奇等的动摇，英方认为海员工人是不难对付的，又由于这时罢工的还只限于数千海员，英方指望通过在上海、印度、菲律宾等地招募新海员来代替罢工海员的方法，可以彻底破坏罢工。因此，他们拒绝和海员谈判，于1月13日撤回原来提出的增加工资条件，夏理德并且威吓罢工海员说，如果再不屈服，就将永远失掉工作^③。

事情的发展出于英帝国主义者意料之外。招募新海员的毒辣手段，在中国各地工人一致支援罢工海员的斗争的坚强阵线面前，遇到很大的挫折，没有显著的效果。一月底香港运输工人战胜了英当局的重重阻挠而举行了同情罢工，香港出入口货物无人起卸，工商业顿时陷于停滞。英当局于2月1日下令封闭海员工会，稍后又封闭同德、集贤、海陆理货员等工会（都是运输工人的工会），但这些高压手段，丝毫不能阻止罢工的扩大。

运输工人的罢工使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英帝国主义者眼见破坏罢工已非单纯高压所能奏效，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谈判。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三个星期。英国当局一方面唆使在它控制下的香港东华医院、华商总会等机构出面“调停”，希图把海员骗上“先行复工，条件后议”的圈套，一方面则通过驻广州的英国领事詹美逊，向广州国民党政权进行拉拢，希望在广州掌握军政实权的陈炯明，帮助英方限制和阻止海员罢工的继续发展。

代表全体罢工海员的意志，海员积极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④在谈判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谈判中首先遇到的关键问题，就是海员工会的启封和恢复。英国当局认为这有关它的“威信”，提出要海员工会改变名称和地址以后，英方才能让工会恢复活动。海员中的少数动摇分子，竟然主张让步，将香港海员工会改为支部，总会迁回广州，“以为变通之计，庶港政府易于接纳”。^⑤苏兆征等坚决反对这样的意见。在谈判当

② 《市日大工资料》（以下引文简称《资料》）第14—15页。这是上海申报有关海员罢工消息的汇集，现藏广州中山图书馆。

③ 夏理德1922年1月18日的告示，见《资料》第18页。

④ 海员工会在谈判中的四个代表，最初是苏兆征、翟汉奇、卢俊文、陆常告。2月15日，原任海员工会会长的陈炳生因杀害妻子被捕，苏兆征被选继任会长，代表由林伟民代替。

⑤ 《资料》第49页。

中，香港的紳士們紛紛要求海員代表妥協、退社，蘇兆征起來說：“我們來港談判以前，各同人對於恢復‘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十個字，万众一心，表示如果不恢復會名，宁愿一齊死在廣州城，都不愿回到香港。這樣，我們決不能接受更改會名的做法。”^⑥的確，這不是簡單的一個工會名字的問題，而是英帝國主義者是否在中國人民的團結面前承認失敗的問題，是必須據理力爭的。

到了二月中旬，罷工海員堅持鬥爭的困難一天大似一天。一方面，罷工經費不足，許多罷工海員在隆冬中睡地板，又無被蓋，每人每天只吃上兩頓一角錢的飯，生活十分艱苦。又一方面，這時從國民黨廣州當局（特別是陳炯明）到廣東的商業資本家都不愿罷工堅持下去，催促罷工海員們迅速收束罷工，“見好收蓬”。蘇兆征等人，在中國共產黨和廣東勞動人民的鼓勵和支持下，和絕大多數海員一起堅持鬥爭。海員們斗志昂揚，彼此互相勉勵：“頂硬上，兄弟，咪俾人睇小（粵語：“不要讓人看輕”）！”海員們終于擊破了英國當局所策動的接二連三的“調停”丑劇，把鬥爭堅持下去。

3月1日全港工人的同情總罷工使鬥爭形勢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使罷工鬥爭發展到第三個階段。英國當局雖然立即宣布戒嚴令，調集大批兵艦，禁止火車通行，企圖以暴力阻止罷工的實現，甚至對步行回廣州的罷工工人開槍射擊，造成3月4日的沙田慘案，但是，全港工人不顧英帝國主義這一切橫暴的干涉，仍然實現並擴大了總罷工，使全港各行業都不得不關門，香港頓時變成了死港。

在中國人民的沉重打擊下，老練、狡猾的英國當局估計了當時的鬥爭形勢。它也知道，罷工繼續發展下去只會給它帶來更不利的後果，因此，必須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失敗來換取罷工的結束。這時，詹美遜和陳炯明已經更密切地勾結起來。為了取得英帝國主義對他背叛孫中山的更大幫助，陳炯明公開出面要海員工人恢復和英當局談判，並且派出廣東政權的代表陸敬科參加會議。3月5日，談判達成了協議，英國當局屈服了。

3月6日，英當局明令取消封閉海員工會的反動命令，並且同意“撫恤”沙田慘案的死難者；輪船資本家同意增加工資約百分之二十。6日下午，香港會督代表英國當局送回工會招牌，十幾萬人看着“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的牌子緩慢地升起來，“工人萬歲！”“海員工會萬歲！”的歡呼聲响彻了香港，人民慶祝了自己的勝利！

（二）海員鬥爭策略的特點

海員罷工中，海員鬥爭策略的顯著特點是同盟罷工和經濟封鎖的密切配合。在此以前，中國人民在反帝鬥爭中曾經分別運用過這兩個武器。1858年，在反對英法侵略軍侵占廣州城的鬥爭中，就有二萬多香港工人罷工回到廣州，使“夷人身司炊爨，不堪其苦”^⑦。1884年，香港船舶修造業工人、搬運工人等，又曾為反抗法國侵略和英當局的

^⑥ <資料>第56頁。

^⑦ 夏 燮：<中西紀事>卷13，<粵民義師>。

压迫而举行过同盟罢工^⑧。至于经济绝交，从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以来，中国人民曾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多次使用过这种斗争方式。香港海员罢工在过去的斗争经验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高。

罢工爆发前，海员们就已有较周密的布置。1921年6月4日，在工会全体同人大会上决议成立加工维持团，这是准备罢工斗争的专门机构。以后又在维持团领导下成立“征求队”、“劝捐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等，并且在香港设有秘密机关，以便促进罢工的实现和争取胜利。在广州还设立总办事处，准备接待罢工爆发后回广州的工人。

罢工开始后，广州办事处组织了纠察队，分派到广东各港口去，禁止粮食输港，并对内河和沿海的轮渡实行严密管理。当时广东的内河航线只有得到海员工会的批准和监督才能通航^⑨。在汕头另外设有分办事处，对香港也严密封锁。汕头商会曾向分办事处请求，对于专运粮米的船只，准予航行入口，因分办事处不同意，卒无法实现^⑩。

这一套由罢工海员执行经济封锁的办法，是前此反帝斗争中所未见的，非常有力。英帝国主义者为了突破封锁曾经作了疯狂的尝试。罢工开始后第一星期，它取得了陈炯明（当时是广东省长）的许可，派遣海军驾驶平时来往省港的“金山”、“香山”两艘轮船，到广州来，妄想采买粮食、菜蔬。但在罢工海员和广州工人的合力封锁下，“既无搬运工人肯落货，又无船艇肯接人上船”，结果完全失败^⑪。在严密封锁下，香港航运停顿，物价飞涨，帝国主义者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

同盟罢工和经济封锁配合，更增加了经济封锁的威力。在运输工人罢工以前，轮船资本家用招募新海员的办法，可以有一些船只偷偷摸摸起卸货物逃去，到运输工人全体罢工后，航运更完全停顿了。英国当局惊呼罢工“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派出大帮军警监押运输工人工作，美其名曰“保护”。但是，运输工人都不愿受到这样的“保护”，又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⑫。英国当局始终没有办法能够冲破经济封锁。

对香港经济封锁时间一久，在罢工海员方面也发生了两个问题。

一是商人营业问题。在经济封锁中对港贸易停顿，商人特别是进出口商少了许多生意可做，势必要求迅速解决罢工。当时上海商人和广州商人因生意停顿都异常焦急。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致电香港华商总会，催促他们赶快出面“调停”^⑬。二月初，英国当

⑧ 方汉奇辑：《一八八四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又李明仁：《一八八四年香港罢工运动》，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⑨ 1922年《三水关贸易季册报告》：“二月初旬，海员特准中国广威轮船（由三水）开往梧州，派有一班佩带襟章之会员在船监督。”1922年广东各海关贸易册中，尚载有罢工海员管理航运及贸易的许多资料。

⑩ 1922年《汕头关贸易季册·贸易情形论略》。

⑪ 《工人周刊》29号，1922年2月12日出版。

⑫ 《广州英文日报》1922年2月3日。见该报1—3月合订本，藏中山大学图书馆。

⑬ 《资料》第6页。

局实行禁止白米、面粉、煤炭出口等所謂报复措施后,广东商人惶急万状,认为“海員罢工,凡与港沪来往各行号及办出入口貨商店均受影响,商务因之停滞,物价由是奇昂,牵动各方,咸受損失,重以粵地粮食素絀,危机万状”^④,因而他們都主张調停、妥协。由于他們本身和帝国主义也有一定矛盾,又由于不敢甘冒违背“一致对外”原則的大不韙,广东商业資产阶级还不敢公然站到英帝国主义方面;但是,他們对自己的一点“生意”特別关切,更不愿意看到航运只有在海員管理下才能进行的局面延长下去,所以他們又极力劝誘海員們“适可而止”,从早了局。在三月初的談判中广东商业資本家代表出了不少的力量,事实上从旁帮了詹美逊和陈炯明的忙。

一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問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后美、英帝国主义爭夺中国商品市场十分尖銳。香港海員罢工在美帝国主义看来是他們取英国而代之的千載一时的机会。美国人伪善地对罢工海員表示同情。上海《大陆报》发表社論对香港英国当局无理封閉海員工会的暴行加以嘲罵,說这种行为和沙皇与德国霍亨索伦王朝警察制度底下的做法是一样的。《大陆报》并且駁斥了《字林西报》的造謠,指出《字林西报》說的“如果接受罢工海員所提条件,以后每月每船須增加支出一万到一万五千元”是“对公众的欺罔”^⑤。罵得倒真痛快,可是我們不会忘記,首先采用招雇菲律宾籍新海員的手段来破坏海員罢工的,正是美国的太平洋、提督等輪船公司,他們一下子就开除了中国海員二千多人^⑥,而且正由于这一毒辣手段已經收到了一定效果,到二月中旬美国輪船滯留香港的为数不多,美帝国主义者才能那样轻松地以隔岸观火的态度來說风凉話。不管怎样,如何利用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使它們不会协而謀我,进而使我們能够更有力量地打击当时的主要对象,这是罢工海員面对的問題。

海員罢工時間不长,罢工的領導还不統一,也不够强,因此对这两个問題都沒有能够很好解决。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海員罢工的斗争策略,又重新遇到这两个問題。如所周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制訂了“凡不是英国貨英国船及經過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的中心策略。执行这一中心策略的結果,“解除广东經濟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綫,最后还促进广东經濟的独立发展”。^⑦这一中心策略的正确乃是省港大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的原因。我們在前后对比中可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体会到,中国工人只有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才能够更好地制定并且运用正确的策略,以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

④ 《資料》第54頁。

⑤ 1922年2月5日《大陆报》社論,轉譯自《广州英文日报》。《申报》曾摘譯这个社論为文言。

⑥ 《資料》第24頁。由于美国輪船公司搶先雇用新海員,开走了一些船只。到2月中旬,在停泊香港口內的166艘輪船中,美国船只有8艘。

⑦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簡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36頁。

(三) 国民党政权对海員罢工的态度問題

海員罢工期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但是，掌握軍事、政治大权的陈炯明却正在策划着背叛孙中山的密謀。罢工结束后不到半个月，孙中山北伐的支持者邓铿被暗杀，这是陈炯明叛变活动的开始表面化。这年六月，陈炯明炮击总统府，正式叛变孙中山，投到帝国主义和北洋軍閥的旗下去了。因此，在探討国民党政权对海員罢工的态度时，应该把孙中山和陈炯明分別开来考察。

孙中山在海員中是有相当影响的。在辛亥革命后，他在日本橫滨联络陈炳生等成立“侨海联义社”，担任运输軍械等革命工作。以后“海員慈善社”和“中华海員工业联合总会”的成立，孙中山都曾予以贊助^⑮。在海員罢工爆发时，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贊助罢工的。在广州市国民党支部、广东群报社等处設立招待罢工海員的住所，国民党方面张继、謝英伯等(他們又标榜无政府主义)，也被派参加罢工总办事处的工作^⑯。

但是，到了罢工的第二个阶段，国民党的态度就有点改变了。二月初，国民党外交人員陈友仁写信給《字林西报》，声明孙中山的政府并不对海員罢工負有責任。接着，国民党报刊相继发表社論，主张罢工海員从速与英方談判，接受“調停”，适可而止^⑰。

国民党态度的改变，其原因可以从上述国民党人員和报章的言論中看出来：

陈友仁說孙中山并不贊助海員罢工：“已經着重指出过广州和香港之間的經濟依存性。我还要指出：孙大总统正在筹备一項軍事行动，其成敗可能大受广州方面工业不安宁的影响，因为广州乃是孙中山向长江流域进军的主要供应基地^⑱。”这就是說，国民党政权需要英国当局的經濟援助，正在准备北伐的孙中山不愿意在广东和英国发生重大冲突，以免影响主要供应基地的安宁。

《广州英文日报》社論說：“在海員罢工中受到最沉重打击的人乃是中国人。金錢的损失和物資的浪費都是很大的。……認真、严肃的人們，有誰愿意罢工延长下去呢？”又說：“我們自己的房屋里有很多火药，我們不能够对邻居火灾中火星四射表示快乐的。”^⑲这就是說，国民党领导分子因广东商业資本家遭遇損失而感到切肤之痛，而且担心香港海員罢工会引起广州的罢工浪潮，給他們带来大的麻煩。

国民党对海員罢工由支持轉为冷淡，这是資产階級在民主革命中两面性的表现。他們还没有理解到，孙中山北伐的成敗，主要取决于是否获得工农群众的支持，而一个对

^⑮ 《中华海員工会二十年之奋斗史略》。載《劳动季报》第1期，1934年4月出版。

^⑯ 在海員罢工初期，国民党給予罢工的一点帮助，資料散見当时报刊。此处系根据长野朗：《交那の劳动运动》第224—225頁，因資料比較完整，所載事实已經查对，大致无誤。

^⑰ 陈友仁信，見《广州英文日报》2月17日。《广州英文日报》于2月6日、20日均有社論論海員罢工。

^⑱ 同注^⑰。

^⑲ 同注^⑰。

工人階級反帝鬥爭採取漠視態度，希望它越快結束越好的政權，是不會得到工农群眾的熱烈支持的。

至於陳炯明對海員罷工的態度，則自始至終是從他的策劃中的政治陰謀出發的。

在罷工初發生時，陳炯明對罷工也極力表示贊助，每天由廣東政府給海員借款數千元。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減弱孫中山在海員中的影響，妄圖將海員收為己用。但是，陳炯明的盤算落空了。罷工海員們也非常明白陳炯明幫助罷工的內幕，他們利用了陳炯明的經濟接濟，而始終未被陳炯明利用去作政爭的工具^{②③}。

隨著罷工進入第二階段，英帝國主義對陳炯明使用了軟硬兼施的辦法。一面禁止白米、面粉、煤炭等出口，對廣東實行反封鎖，另一面則由詹美遜進行收買，暗示可以向廣東政府借款和投資。陳炯明急於要得到英國的經濟幫助來反對孫中山，就不惜對海員罷工進行干涉和破壞了。

二月下旬，英國當局策動的幾次“調停”都被海員代表拒絕，全港工人總罷工一觸即發。這時，英方急想在總罷工爆發前獲得解決，便極力催促陳炯明為它效力。陳炯明指使其黨羽兩廣交涉署人員李錦綸對蘇兆征等施加壓力，要罷工海員接受英方條件，並說明“若海員開大會，省長可到場解說”，企圖以省長的地位迫使罷工海員屈服。蘇兆征當即指出英方條件離海員要求尚遠，拒絕接受，陳炯明沒有達到目的^{②④}。

香港全市工人總罷工後，英國當局已到山窮水盡之境。對總罷工的高壓引起了廣東人民的無比憤慨，一場更大的反帝風暴即將到臨。老奸巨猾的詹美遜見事勢危急，即於3月2日赴港密商對策，次日致電陳炯明請廣東政府派代表與海員代表一同往港談判。陳炯明接電後，派出交涉署的陸敬科前往，渴想早日恢復貿易的廣東總商會代表也一齊出發。在這次談判中，英國當局雖然不得不接受海員方面大部分的條件，但是却狡猾地拒不提供有效的保證。輪船資本家也不肯補還罷工期間海員工資。陸敬科和英方唱雙簧，做好做歹，由何東虛偽地擔任罷工期間海員工資的支付。3月5日，協議簽字了^{②⑤}。

這時廣州城內已遍傳沙田慘案的消息，人心激憤，在沙面區工作的中國職工立即酝酿罷工。陳炯明一面出示保護英國僑民，阻止沙面華工的罷工準備活動，一面又親自出馬對數千海員講話，動員他們接受協議條款。他把罷工稱做“工潮”，說罷工使香港和廣州的商民同樣遭受損失，因此罷工的結束是值得欣幸的。

陳炯明和詹美遜為海員罷工的結束而互相慶賀、致謝。正是這同一個詹美遜，在四年後安排了对廣州游行群眾的屠殺，造成沙基慘案。在慘案發生前夕的一封信里，詹美遜悍然預告了要对中國人民開槍：“吾人必須預先採取手段，以防止類似在鎮江、九江、漢口曾經發生的群眾暴行（按：指群眾的反帝鬥爭）。若不幸此間發生同類事故，

②③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59頁。

②④ 《資料》第92頁。

②⑤ 《資料》第99—101頁紀陸敬科對記者談調解經過甚詳細。參看《廣州英文日報》3月5日—7日。

煽动群众作出暴行的那些人必将碰得头破血流。”^{②⑤} 这就是陈炯明諛諛地称为中国亲爱友人的詹美逊的猙獰面目！

海員罢工虽然胜利了，但是胜利的基础不够牢固。由于海員們沒有能够抓紧罢工第三阶段的有利斗争形势，乘胜追击，使英国当局和輪船資本家完全接受海員的条件并提供切实的保证，所以后来英方得乘海員工会組織涣散的弱点完全不肯履行協議的条件。

陈炯明则因执行英帝国主义的意旨得力而获得主子的宠信。他在不久以后就公开背叛孙中山，并于1923年和英国进一步商定秘密借款。陈友仁談論什么“广州与香港間的經濟依存性”，他是錯了，只有陈炯明之流能够得到英国侵略者的“慷慨”援助，反帝的孙中山和帝国主义者之間是談不上經濟依存的。

（四）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組合書記部对罢工的帮助問題

中国共产党和在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对香港海員罢工作了有力的援助。这些援助对罢工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上文曾經說明，在罢工第一阶段里，英当局和輪船資本家把破坏罢工的希望寄于招募新海員。他們特別希望招到上海的甬籍（浙江宁波）海員。在中国海員工人中，宁波海員的人数仅次于广东海員^{②⑥}。由于地域和行帮观念的影响，双方过去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团结合作。1914年宁波海員罢工，因广东海員未能全力支持而失敗^{②⑦}。帝国主义者抓住这一点，认为大量招募宁波海員来代替香港海員是有把握的，这就可以彻底破坏香港海員罢工。他們于海員宣布罢工后立即发出火急电报，指使其在沪代理人桂阿毛等招募宁波海員。

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在海員罢工发生后即发动上海各工团組織“香港海員后援会”，并对帝国主义者招募新海員的阴谋展开斗争。書記部李启汉同志因为到桂阿毛住宅提出警告，被暗探逮捕。到被释放出獄后，他又和朱宝庭等赶到碼頭上对应募海員进行劝说，反复讲明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能破坏工人的事的道理。由于書記部在上海海員中作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帝国主义代理人在上海能招到的新海員人数不多。这些新海員路經汕头时，又被汕头办事处說服而回去了--大半。第一批新海員到香港的不足三百人^{②⑧}。

帝国主义者招募宁波海員的計劃受到打击，使他們破坏海員罢工的阴谋不能实现。从別处（菲律宾、印度）虽然招来了一些“海員”，可是人数不多，作用很小。拿菲律

^{②⑤} 伦敦《泰晤士报》1925年6月25日。轉引自博尔格：《美国政策与1925—1928年的中国革命》第41頁。此处譯文，系用余繩武同志的譯文，謹注明。

^{②⑥} 邓中夏：《我們的力量》，載《中国工人》第2期。中夏同志估計，远洋輪船中的華籍海員，宁波人約四萬以上，广东人約六萬以上。

^{②⑦} 《民聲》，第21号。

^{②⑧} 雷加：《海員朱宝庭》，第26—29頁。

賓“海員”來說，他們原來大部分都不是在輪船上工作的，因貪圖資本家的臨時高薪給而來，但技術很差，兩三個人才能做一個中國海員的工作。他們既患暈船，又患思鄉病，與其說是對航行的幫助，不如說是妨礙^⑩。雇用這樣的人當然不能代替香港海員了。

到罷工的第二階段中，罷工海員的困難日增，在帝國主義者的“調停”騙局下，少數領導人發生動搖，而國民黨政權與廣東資產階級更從旁施加壓力，此時海員要堅持下去，所急需的是全國人民的支持、鼓勵，而特別需要鬥爭策略上的指導。中國共產黨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動了遠在北方的鐵路工人，組織後援會，捐款援助。京漢、京奉、京綏、津浦各鐵路俱樂部同人，決議每人捐助一日薪金，京漢路火車頭上豎起“援助香港海員”的大旗，往來北京漢口。這些在北洋軍閥反動政權下的空前壯舉，對於艱苦奮鬥中的海員工人是極大的鼓舞。

二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發表《敬告海員罷工》。在這個文件中，首先指出海員們的要求是正當的，是會失敗的，勉勵海員們繼續鬥爭，聲明共產黨將盡力為之後援。接着，文件指出資本家有很多陰謀詭計，我們必須加緊提防，着重提出海員們要“堅持到底”和“團結一致”。文件說：“我們最後向船東提出的條件，那是……為爭個人生存上最低限度上的一種，斷不可因威脅利誘而稍形退讓，任何人出面調停，必須如願相償，方可應之”。又說：“我們勞動者戰勝資本家的優點，就是仗着人數多，合起群來，有階級覺悟，若使不能團結行動，資本家就不難用種種方法把你各個攻破。”^⑪

這些建議是根據當時罷工鬥爭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是符合鬥爭發展的實際要求的。特別是“堅持提出條件、不可稍形退讓”這一着，是針對帝國主義者“先行复工、條件再議”“由調解人（華商總會或全港工團）担保，先复工再恢復工會”等等“調停”騙局的唯一正確對策，對於罷工海員堅持鬥爭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二月下旬，全港工人總罷工迫在眉睫，英國當局為圖打消這個總罷工，乃策動“華人機器會”發動所謂全港工團調解，企圖以工人制止工人。海員工會得到消息後，即召集大會決議反對，群眾情緒激昂，高呼“工人兄弟團結一致”“打倒調停機關”等口號。在罷工海員反對“全港工團”調停的通電中，嚴正指出：“經在省城……議決提出九條件，須船東完全承認乃行開工，若船東不能全認，則無調停可言。如有退讓，則同人誓死不承認也。且華人機器會同為工界一分子，調人資格宜由第三者任之，以示大公。”^⑫香港各工團接此電報後，都覺悟到是受英當局的愚弄，便立即取消調停，一心準備發動總罷工。

不难看出，罷工海員大會和他們發出通電的提法，是受到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敬

^⑩ 《廣州英文日報》1922年2月15日刊載：《罷工結束後菲律賓海員是否會被留用？》按英當局和輪船資本家在二月份內仍然極力招募新海員，最後共募到寧波海員二千多人。但是，在運輸工人罷工後，光是招到海員已經無濟于事，海員中廣東幫與寧波幫行幫思想的消除，到1925年方才解決。

^⑪ 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敬告海員罷工》（鈔本）。

^⑫ 《資料》第88—90頁。

告海員罢工》一文的启示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海員罢工作了重要的帮助，当时海員积极分子如苏兆征等就認識了只有共产党才是自己的政党。兆征同志事后說：“我当时到处找党，总找不到手。”^③ 经过海員罢工后，广大海員对国民党的动摇有了認識，两相对比，更明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得到胜利了。到1923年冬天，海員工会便清除了把持工会的翟汉奇等少数蜕化分子，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組織坚强的队伍^④。

（五）結 束 語

工人階級是能够最坚决地和反动統治者进行斗争的階級，但当他們还没有自己的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来领导，即他們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斗争的阶段时，那么斗争的結局終归不免于失敗。这是职工运动全部历史所已証明的真理。

香港海員罢工同样証明了这一真理。海員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发生的。共产党一成立，立即把主要力量放在工人运动的领导上去，并为此成立了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海員罢工从工人运动的全局看来乃是党所领导的全国工人斗争的一部分。党和書記部的帮助和指导对于海員罢工的坚持到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中国工人运动整个历史來說，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工人階級由自在階級到自为階級这一转变的最終完成。海員罢工紧接着取得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头一次大规模胜利，这絕不是偶然的。

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海員罢工还没有可能直接领导，在罢工的领导人中还没有共产党员，这一情况又使得罢工的胜利不够彻底和巩固。由于海員工会的领导还不統一，杂有陈炳生、翟汉奇等动摇、妥协分子，到罢工最后阶段中，就没有能够掌握有利斗争形势坚持条件，結果最后協議的条件，增加工资数额和海員原提的数字还有相当距离，取消包工制的規定亦不明确，授敌以隙，致使帝国主义者和輪船資本家以后得乘机反复，破坏条約^⑤。这又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必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到底，才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而且必須不断純洁自己的队伍，加强組織的战斗力，才能巩固胜利的成果。

香港海員罢工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意义是很大的。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并且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标志着中国工人階級由自在的階級向自为的階級的轉化。通过这次罢工，还教育了中国工人階級学会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运用正确的策略，培养了苏兆征、林伟民等中国工人階級的优秀領袖，提高了广大海員工人的思想觉悟，充分証明了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中提出的“罢工是工人的軍事学校”的著名論点。

^③ 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④ 苏兆征、林伟民等同志到1924年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此以前，党对海員工会已經有坚强的领导。

^⑤ 苏兆征：《中华海員工业联合总会报告》，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174—181頁。